

若再「排華」美國華人社团能重結抵制嗎？

最近一段时期，章莹颖案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此案从章莹颖失踪，到嫌犯被捕的整个过程中，都可以看到美国当地华人活跃的身影。在章莹颖失踪之初，他们就通过微信传递信息，组织志愿者寻人。这起失踪案也是最先从华人自媒体爆出，引发国内媒体的瞩目。自去年梁彼得案之后，我们再次看到华人力量在美国社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中国海外华裔群体的日益壮大，华人社团也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功能。这些华人社团现状如何？在当地华人社会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又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和挑战？本文将以美国华人社团为例，解答这些问题。

随着国家的国力日益增强，海外华裔的群体日益壮大。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全美约有452万华裔，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2%；过去10年华裔数量增加的速度超过30%，是美国人口增加的最大群体。

社团虽多，但活动多是自娱自乐。

美国华裔人口的迅速增加，给华人社区的结构带来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华裔移民集中的州，如加州、纽约州（美国华裔居住最集中的地方，约占50%），海外华人对华人社区活动的需求趋于多样化，一些专业协会、老乡会以及其他以社交媒体为基础的华人社团应运而生，使得原有在美华人社团结构有被改变的趋势，为华人社团的生存角色提出了新的挑战。

据统计，目前华人在美社团团体多达六千多个，虽然数量很多，但其特点仍然以松散为主。许多社团的活动甚至只是自娱自乐，为此作出了多方努力。比如，2016年8月的首届美国华人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庄召开，其影响力有多大，很难评判，许多华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活动，大会的代表性还不够。因此，关于华人社团联合重组的新思考有其必要性、其迫切性，因为这关系到所发出的声音是否能代表整个华裔群体的心声，更重要的是，这还关系到华裔群体的子孙后代。

华人社团为何缺乏凝聚力？

要想改变华人社团的结构，走联合重组之路，必须先了解华人社团的基本特点。首先，个体联系的小团体居多，比如老乡会，其结构松散，

并没有一定数量的固定成员。其二，虽然各团体都仿照西方有其章程，但有的章程过于模糊，没有约束力；有的选举和运作不公正不透明，让社团失去公信力和凝聚力。第三，受华人传统观念束缚。有的社团负责人仍有“大佬”情结，不愿服从社团赋予的法律条款，办事遵从“小山头”，一团和气。这个“典型”观念往往反映在服务于一个社团后，又去组建另一个属于自己的社团，虽然多个社团并无不好，但容易造成个人之间的猜忌和矛盾，给外人造成华人之间不团结的印象。第四，由于隔代移民对于美国文化教育和社会的认识差异，在美华裔

利益的保护不是通过团结来实现的。比如，2011年10月被昭雪的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虽然海外裔社团走向联合之路任重而道远，但我坚信联合之路不会太遥远。

首先，要培养新一代的华人社区领袖。华人二、三代移民已经成熟，他们出生在美国或成长在美国并毕业于美国学校，服务于各行各业；思想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即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又有鲜明的是非意识；无论什么国籍，骨子里是“中国人”；对于化解新老移民的矛盾、帮助新移民尽早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因此培养华裔二、三代社区领袖是当务之急。

其次，华人社区急需一批能不计个人得失、充当“先驱(pioneer)”的人，“先驱(pioneer)”的特质是：1、不计个人得失，即不要追求自己在社团的职务，要乐于默默奉献；2、要有是非观念，对于不公平不透明的人和事要敢于挑战。要做到这点，必须在实践中加强华裔社团的公信力教育。华裔社团应成为一个考察人领导力、对社区贡献力的舞台，进而成为培养华裔社区领袖的摇篮。

再次，华裔社区结构变化要逐步改变“大佬管理”的传统思想，使年轻人能够脱颖而出。我们的管理应遵循尊重多元、公平、公正的原则，为下一代创造条件，使他们能真正成为海外华裔社团的领袖。

最后，重视国内政策对海外华裔社团的引导作用。华人的文化情结，少不了有“衣锦还乡”的传统意识，许多华人社团的成立实际上也与这个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近年来，国内举办各种海外侨社的活动，可谓是接二连三，应接不暇。各个地方，特别是家乡的活动、优厚的政策吸引海外华人回国，使得各种华人社团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笔者认为这是好事，但问题在于缺乏引导，其负面影响是从另一个方面鼓励了松散型华裔社团的出现。因此建议，国内邀请海外社团的活动应有一个基本的筛选过程，从资质上加以考量，其筛选的标准应该包含：成员人数、社团的作用、社团活动、社团的历史等等，这样从侧面面对华人社团的发展将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作者系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会长。原标题为《走联合之路，推动华裔社团发展》，现标题及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澎湃新闻获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授权转载。）



社团很少包含在美成长的二、三代移民，缺乏对在美华裔社团的认同感和融入。

这些特点是造成部分在美华人社团缺乏凝聚力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对下一代的传承上存在极大问题。近年来，部分在美华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不利局面，各种以海外华人团结为目的的新型组织时有产生，比如前述首届美国华人大会、波士顿华人联合社团、南加州校友总会、加州会长联谊会，等等。这些新型组织虽然内部运作还不够完善，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海外华人的凝聚力，至少在组织结构上迈进了一步。

规则：解决华裔社团分散的关键

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在美华裔社团分散的局面，如何制定有效规则和如何按照既定规则进行运作是关键深层次的主要问题。有效规则应以公正透明为基础，规则不是讨价还价的结果。其次，有了有效的规则如何执行，要有严格的对错赏罚机制。有了这些机制，才能保证人人有机会、人人有责任，才会逐步消除内部分歧的局面。这个机制是要通过磨合、有公信力的领导力来实现的。有了这个机制，联合体才能逐渐有实质性地形成，不团结、各人为己谋利的局面也会逐步改善。

回顾历史，没有哪一次华裔权

原標題：美《外交政策》雜誌：華人會被關進集中營嗎？

最近一段時間，中美在將來會發生衝突的話題越來越多地被媒體和分析家提起。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今天發表文章，題目是，下一個集中營，在美華人在戰爭中會被關押起來嗎？

一旦中美髮生戰爭，不可避免地成千上萬的在美華人會被懷疑，遭遇監控，甚至被迫害。那麼，考慮到美國歷史上的糟糕先例，會有一部分，或者全部在美華人被關進集中營嗎？

在美華人的總數很難估計。文章說，國土安全部估計有24萬中國公民合法居住在美國。另外大約有26.8萬非法居留的中國公民，這樣估計的話總共有大約50萬中國公民。另一種是把華裔的230萬的總數，減去大約48%的美國公民和永久居留者，估計有100萬左右中國人。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國土安全部曾多次說中國留學生在美有30萬人，這篇文章沒有提及。不過，50萬到100萬之間的範圍很大，也許已經包括了留學生。

這些在美中國人的存在有可能引起猜疑，認為中美衝突的時候會有人搞破壞，成為第五縱隊，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美國社會反華的偏見由來已久，在中國“淪陷”為共產主義國家以後，更是火上澆油。甚至進入21世紀以後，一位華裔作家憤懣地寫道，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接受程度仍然隨着中美關係的變化而變化，在美華人自身的行為和努力被無視。

現任美國政府把這些更推向極端。川普在就職以前對中國激烈言論，以及對二戰時關押在美日本人的認可態度，都讓人更加擔心中美之間的衝突會導致針對在美華人的暴力行為。

在這種敵意的語境里，文章說，如果回顧二戰時期，由於種族偏見，政府無能，政治軍事領導人強權，以及媒體和社會輿論默許，導致了12萬在美日裔被送進集中營關押。

文章說，今天這樣的困難在於，中國人的數量比當年日本人大很多，技術上操作就困難得多。而各種法律法規也限制政府對任何種族採取這一行動。

文章最後說，政府只有鼓動美國公民社會和各重要機構一致來貫徹反華人的政策，才能夠做到把在美華人送進集中營。而歷史表明，美國社會在受到威脅的時候，種族主義就會不可避免地抬頭，因此在美華人也就只有困在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衝突中，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是什么。可以看出，作者認為，在當前的政治氣氛下，中美衝突中在美華人被送進下一個集中營的可能性在增大。

雖然作者試圖從美國歷史來預測美國華人在假想的中美衝突中是否會被送進集中營，但是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那就是中美兩國在現代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是中美兩國的博弈。尤其是朝鮮戰爭，是兩國軍隊大規模正面戰爭。

朝鮮戰爭時，儘管美國軍隊遭受了巨大的傷亡，近37000名士兵陣亡（十多年來美國在伊拉克總共陣亡不到5000人）美國並沒有掀起大規模的反華浪潮。

中國現在的和平崛起也和日本當年在亞洲的一直奉行的軍事擴張完全不同。日本的軍國主義直接導致日本襲擊是美國領土的珍珠港。中美之間的衝突，即使發生，很有可能也像當年的朝鮮戰爭，是在第三國的領土發生。

所以，回到外交政策的這篇文章標題提出的問題，中美衝突的可能性在理論上一直存在，而在美華人會受到一定影響，但是被關押到集中營的風險，如果可以量化的話，應該是一個很小幾乎可以忽略的數字。

掀起反華大旗——華人會被關進集中營嗎？

舉紅旗、喊口号就是“愛國”的想法，不僅是懶惰、不負責任的，也是危險的——既對中國毫無實際支持與幫助，又極易招致主流社會的疑慮，虛名未得而實禍已至。

祖籍國情感的打開方式

在任何一個多元文化、多元種族的國家，如何擺正對居住國“國家效忠”和對祖籍國的“族群感情”之間的關係，是每個“非土著”族裔不容迴避、必須正視的第一課題。無論是英格蘭裔、蘇格蘭裔還是愛爾蘭裔，無論是猶太裔還是阿拉伯裔，無論是華裔還是日裔，都必須在正視這一課題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自己對祖籍國情感的正確、恰當、有效的打開方式。

肯定的是，形式主義的政治作秀若成爲唐人街主旋律，不利黨、不利國、不利族，甚至極易給當地唐人街招來無謂的災禍。

我們也必須承認，唐人街形式主義的背後，除了一部分人的無知、另一部分人的投機之外，也與中國相關部門尚需更努力克服的形式主義有關。中國相關部門應認識到，這三十多年來，包括澳洲在內，海外華人華僑在經濟地位、教育程度及政治參與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應與時俱進地調整僑務政策，要清醒、客觀、充分認識到華人華僑在當地紮根安居（電視劇）才最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要鼓勵華人華僑擺正對居住國“國家效忠”和對祖籍國的“族群感情”之間的關係，減少和避免空喊口號、表演重於實質的“唐人街形式主義愛國”。

這些對中國來說，不僅意味着必須更爲與時俱進地調整政策，而且涉及更爲深刻的政府職能轉變。因此，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唐人街形式主義對中華形象的拖累。對海外華人來說，只有少些政治投機秀，踏實勤勉，才能夠理直氣壯地反擊帶着傲慢、自卑及偏見的無良媒體，真正融入主流社會。（雪珥 作者是澳大利亞華裔學者）

海外華社政治投機者拖累中國形象



一個呼之欲出的合理推測似乎是：中國或中共深謀遠慮，在當年那樣的大風波中還埋伏下大量的“深海同志”。

被做成生意的“主義”

當然，對於如此推測，唐人街大量知情人士無非會心一笑。與唐人街人士不同，大多數

澳洲人恐怕很難理解，某些華人爲獲取利益而進行政治投機，將“主義”做成“生意”，已相當嫋熟：先塑造自己作為“中國暴政”的受害者形象，以反共反華獲取綠卡，在綠卡到手後再搖身變成“愛黨愛國”的僑領，以期分享中國發展的現實紅利。

以政治投機的方式獲取綠卡，在澳洲、美

國的唐人街上絕非個案，亦非秘密，在某些時候的某些地區甚至形成相應產業鏈。尤其是當年那場大規模政治風波，實際上成爲大批量“搭便車”獲取綠卡的良機，僅澳大利亞一國就集中批准4萬人，創下西方接收“政治難民”的紀錄，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爲“信仰”，彼此心照不宣。當然，西方政客們未必知道其中的貓膩，但他們需要“群衆演員”的配合，雙方各取所需。毫無疑問，“搭便車”者的批量涌人，本身就說明政治投機的紅利相當可觀，他們的行爲習慣注入唐人街後，也加劇唐人街的政治作秀，令唐人

街原本對故土故國的淳樸情感變得複雜而功利。

相比於扶危濟困、敬老愛幼等需要低調而持久的傳統社區互助活動，那些更有舞臺感、更能引起媒體關注、更能令“國內領導滿意”的活動，越來越熱鬧。比如支持中國的南海主張，這本是全世界中華兒女捍衛祖國的本分，但海外華人畢竟首先是居住國的公民，不能不考慮如何將族群情感與國家效忠相結合，至少要爲此找到一個有說服力的結合點，以有效地向主流社會解釋支持中國的南海主張如何符合居住國的長遠利益。

這就需要海外華人建立與主流社會有效溝通的渠道，而非簡單地上街遊行。那種認爲